

1991.7.10

0040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群体简论

张德旺

黑龙江大学历史系
1991年7月

论 文 提 要

论文通过对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发展、历史作用和总体特征的探讨,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论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论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向工人阶级转化的,基本代表了工人阶级政治要求乃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崭新政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发展三阶段。

第二部分论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的巨大历史贡献。

第三部分论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总体上的三个突出特征:自觉的主体意识,彻底的求实作风,强大的凝聚力量。

全文注意对近几年来五四研究、文化研究、建党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以及某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影响较大的“新”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批驳和争鸣。

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群体简论

从五国爱国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时期。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继往开来、激流勇进,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本文拟从总体上对这一群体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进行粗略的探讨,以求教于党史界各同志。

(一)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向工人阶级转化的、基本代表了工人阶级政治要求乃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崭新的政治派别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是偶然的。

首先,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工人运动的兴起,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和阶级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英法德俄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掠夺,使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日美在华工业有很大发展,两者都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六三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彻底革命无所畏惧的伟力,从而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本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的迫切需要。这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最根本最直接的促进因素。

其次,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学习西方屡遭失败的惨痛教训,逐渐开始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重重疑虑。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明显暴露的严重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危机及巴黎和会任意宰割弱小民族的强盗行径进一步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学习西方的幻想。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工农武装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为世界无产阶级也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指出了新的奋斗方向,树立了新的行动榜样,这就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大规模传入,一方面,猛烈冲击了以儒家教条理学道统为核心的封建主义价值体系,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可能根本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找不到真正解决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实际途径及相应的社会力量,从而在客观上从正反两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这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创造了直接思想条件。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到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雏形阶段。

所谓“雏形”是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数量很少,尚不能构成一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独立政治群体,但这少数人却初具了后来这个群体形成后有别于其他政派的一些基本特征,特别是具备了这个群体的最重要特征:坚决无保留地拥护向往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努力学习运用其经验、理论指导革命实践。这是他们向工人阶级转变、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起点和关键。

迈开第一步的是李大钊。1918年7月到1919年1月,他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新纪元》等重要论文,明确指出俄国革命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全归于民众之手”,“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必将荡涤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等一切“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创造出一个“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还指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就是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中国人民“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趁着这一线的光明”起而奋斗。

继李大钊之后,一些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迅速成长。其中有的是受李大钊直接影响。毛泽东回忆,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他第一次在北京期间“在李大钊手下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有的是基于个人的独立的理论探索,李达就是1918年6月到东京后放弃理科学专门攻读马列主义,开始确立对马列主义的信仰。

他们中起步较晚、但影响巨大的是陈独秀。1919年1月他还不满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①同年4月,他迅速改变了态度,以他独特的大刀阔斧斩钉截铁的语言对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潮流表示热烈欢迎:“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我们中国人不怕!不怕!”^②中国人民必须学俄国人的榜样,20世纪俄罗斯期的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③

但是这期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群体或政治派别。其主观原因是他们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各种纷至沓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学说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他们还划不清两者的某些界限;即使李大钊也不能免。与此相应,他们之间也缺乏基于共同目标的密切联系,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的自觉性。其客观原因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时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这使无产阶级对革命理论、革命政党已经十分迫切的需要暂且还处于潜在状态;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体系暂时还仍充当着反封建的历史主角,这都限制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且不论一般知识界,就是对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一向极端敌视的军阀政府及顽固派也没注意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崛起。林琴南疯狂咒骂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所举罪状不外是“覆孔孟”、“铲伦常”、“废古文”^④,基本没涉及什么“过激主义”。

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到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前,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崛起,作为一个逐渐转向无产阶级的崭新独立政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影响的阶段。

随着五四运动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受到六三运动中工人政治大罢工的直接鼓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公开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开始自觉地向中国人民传播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思想体系。李大钊公开宣言“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主编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篇文章。他特别突出强调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社会改造“根本的解决”;但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运用“阶级竞争说”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依靠“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这些介绍还相当粗略,但却从原则高度正确回答了当时思想界瞩目的“中国社会如何改造”的问题。初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向无敌的革命锋芒。

这期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陈独秀继李大钊后成为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多次同张国焘等畅谈,“宣传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推翻军阀主义”^⑧。杨匏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邵力子、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向警予、张闻天等一批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青年精英向马克思主义迅速迈进。他们大都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或思想追随者,自觉不自觉地以他们为导师和楷模,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以陈李为核心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辐射国内外的革命政派。

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异常瞩目。反动军阀及封建顽固派对他们极端仇视自不待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引起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警觉严重反感。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打响了资产阶级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枪,就表明了这种阶级意向。

从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后,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多数人最终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阶段。

在这期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杰出代表李大钊、蔡和森等,特别是陈独秀以他在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旗帜鲜明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堂堂正正地摆开阵势,向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主动展开了全面反击,迅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他们还努力直接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心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迅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这一切无比深刻地震动了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敏锐地感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想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再也不“忍不住了”。胡适1920年底1921年初连续写信给陈独秀,攻击《新青年》政治色彩过于鲜明,“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遭陈独秀等坚决抵制后就退出了《新青年》编辑部;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左舜生、陈启天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决反对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学会须有一种共同“主义”的主张,其实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这充分证实,当时中国政治思想界已明确承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真正的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派,社会主义是而且只是他们所坚持的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二)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中发挥了当时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派所不具有的巨大历史作用。

首先,他们当之无愧为这一时期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主导力量。在震撼全国波及海外的五四运动及其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国各阶级各政派无不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只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明确指出,不仅“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的仇敌”,而且“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对军阀政府则“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从而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方向。他们还指出,有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潮推动,才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今后中国必将用“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的方法”最终“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从而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他们深刻阐明了中国社会改造的决定性力量在于人民,要“实现民众的大联合”,“靠自己的力量”“打出一道光明来”。在行动上,他们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彻底决裂的大无畏精神和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坚持不懈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始终推动运动前进”,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马骏、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等就是杰出代表。显而易见,他们是五四运动高潮阶段锋芒毕露风云一时,但运动高潮后很快就流露出厌倦情绪、宣称“对于政治关心”“极无效果”的付斯年和欢迎十月革命关注工人运动,但又鼓吹“学英国资产阶级‘阶级退让’的精神”,“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威胁”^①的戴季陶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远不能企及的。

对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有的同志持否定观点,并以此为基本依据之一断言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时人数太少,其前述有关言论对五四运动的指导“是宏观的,并非有意的直接的指导”,“不能对运动施加重大影响”,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探讨。因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全国进步知识界中数量是少,但在有全国影响的反帝爱国运动领袖人物群中的比例特别是比重却不小,陈独秀的影响就无人可比。这本质上是因为他们集中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内在革命要求和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向。因此,他们前述对五四运动的“宏观”指导就比任何“有意的直接的指导”更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是高瞻远瞩五四运动的全局及其发展趋向,超越旧民主主义的视野而发出的进军号令和战斗呐喊。所以,绝不存在什么李大钊等人能否把五四运动“纳入马克思主义轨道”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这些言行本身就标志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新民主主义轨道,不过当时中国思想界没能作这种理论概括。

其次,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坚持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一系列根本变革。

他们明确指出了近代中国文化领域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原因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向。李大钊断言,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而经济

基础“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变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根本。基于此,李大钊指出封建主义文化如孔子伦理,就是“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的产物。^⑧已完全不适应中国社会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什么民主政治”等等,“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产阶级无关”。^⑨所以,必须基于“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建立“‘劳工神圣’的新伦理”,^⑩也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文化界“五四”前后就文化论文化的唯心主义倾向和崇拜迷信资本主义的全盘西化倾向,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指出了社会主义方向。

他们明确指出了中国的新文化必须以占中国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为主体并真正开拓了向工农大众普及新文化的道路。这一时期“劳工神圣”“开展平民教育”的口号在各新型报刊几乎日不绝书,但真正理论彻底行动坚决的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李大钊明确提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本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⑪陈独秀强调必须“使新文化影响到产业上”。^⑫“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最有用最贵重”^⑬进而有“管理政治、军事、产业”的觉悟。邓中夏等为主干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后坚持活动四年余,经常到北京城乡工农中,把普及科学知识和宣传反帝救国结合起来,就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向中工农大众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

他们真正做到了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贯彻到底,表现出积极的集中外新旧文化精华以构筑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创造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发展新文化的方针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首倡并在北大获得巨大成功,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却不具备把这方针贯彻到底的政治品格,当军阀及封建顽固派压力沉重之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做出某种让步。1919年三、四月间,封建顽固派借陈独秀私德不修大肆造谣,实际是“攻击北大新思潮的几个领袖”,^⑭蔡元培却在“颇不愿”^⑮的情况下实际解除了陈北大文科学长之职,客观上助长了顽固派的气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明确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对于新旧中西文化都“要不满足”,^⑯对各种学说都“不要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坚持在不断的“新旧并立”、“递变”中“听其客观的自然”,任其“融合与否”,^⑰实际展示了中国无产阶级乐于并且能够涵摄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的开放襟怀。实际他们也真正言行一致。陈独秀虽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地批判过辜鸿铭、刘师培等顽固派学者的复古倒退倾向,但又一向充分肯定他们“有专门学问”。^⑱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既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其中“特须注重研究”哲学、伦理、教育、宗教、文学、美学、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之“主义”及“科学规律”;又提出要研究“民族自决”、“经济自由”、“孔子”、“东西文明汇合”、“俄国”、“实业”等林林总总囊括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70余问题。^⑲他们这种宏放眼光,绝非任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能相比。所以,如果说《章程》同“问题与主义论战”有关,那么必须看到毛泽东是从正面理解了这场论战并吸取了双方的积极因素,而决不是如有些同志断言的是简单地站在李大钊一边或主要受胡适的影响。^⑳

第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桥梁作用,由倾向于工人阶级而迅速转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承担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对此,有的同志明确予以否定,他们认为“在党成立之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困难

讲清马克思主义,且容易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灌输给工人阶级”;“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是一个以工人群众为主体的党,而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小团体”,“结论”:“党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④笔者认为值得斟酌。因为“五四”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实际把成立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任务提上了中国革命的行动日程。这使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成为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因为两者是中国创建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直接前提。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就有领导有组织地大力加强了上述工作。

一方面,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通过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出版工人刊物,参加创办现代工人工会等方法,深入到工人群众中,用工人喜闻乐见的通俗浅显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激发、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自觉。这些宣传的全部内容目前显然无法一一查明。但从目前可见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的有关文章和现存《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劳动与妇女》等党早期组织所办刊物的内容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期间尽管还不同程度地有照抄照搬的理论幼稚性,但却基本正确地向工人群众初步介绍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基本正确地提出了工人阶级面临的政治、经济斗争目标和长远奋斗方向。^⑤由此看不出他们“讲清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困难,更难以找到他们把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灌输给工人阶级”的明显例证。结局却是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涌现了一批以长辛店工人史文彬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先进战士。中国就是以此为发端在短短的四、五年内就掀起了波及全国、震撼世界的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

另一方面,同时进行的则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的迅速转化。他们在前述的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也在不断进行自我改造、逐渐抛弃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政治立场转化的最重要标志是在政治上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并且真正为无产阶级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奋斗。在上海,李中发表《一个工人的宣言》喊出工人阶级的心声:“将来的世界,要使它变成工人的世界!”^⑥,在北京、何孟雄等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游行队伍的前列;在法国、赵世炎、王若飞、向警予、蔡和森等深入华工乃至法国工人中汲取革命力量,都表明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立场。该文还说,建党时期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⑦也不符事实。因为就陈一生而言这一结论无可置疑,但套用到五四到建党时期则不能成立。这个时期是陈一生革命事业的巅峰阶段,他对建党的个人贡献在全党当之无愧手屈一指。他的《答知耻》、《〈共产党月刊〉短言》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他深入上海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的行动,都表明这期间他在与工人阶级结合上也不愧是挂帅人物。所以,该文仅称他们为“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能明确界定其政治身份,而应指出、他们这时已属于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民族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革命条件极为成熟,工人阶级在三大重压下缺乏最起码的民主权利文化水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最高精华等特定条件制约下,由上述一批知识分子主要承担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乃是历史的必然,这同党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毫无矛盾。

(三)

五四到建党时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具有一系列优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自觉的主体意识。海内外不少学者断言“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尚未形成人格独立的社会群体”,^①有的甚至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扭曲了投身这个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笔者认为不能苟同。因为强调独立人格、高扬主体意识是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就明确指出,所谓“独立自主人格”就是“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当然他这时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独立人格,不过他当时未能指出这一点。“五四”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后,他们就逐渐把个人的独立人格同阶级的群体人格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一方面仍然坚持独立人格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②;另方面又强调指出独立人格并非孤立的个人问题,而是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一个个人,除去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之外,全不重要”^③,其“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而人民又“绝对没有全民”,“无论在何国家里,都分为‘阶级’和‘党派’”。^④他们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充其量是“人自为战”,“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的”,改造中国社会“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⑤这样,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把“个性解放的运动”和“大同团结的运动”有机结合起来,^⑥既批判了封建纲常礼教的奴隶主义,又克服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漠视群众的阶级局限性,开始建立一种全新的实际是无产阶级的独立人格主体意识。当然这种独立人格主体意识在五四和建党时期还远没健全,后来的发展也有许多曲折,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国民心理素质毕竟由此发端了。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这一优点集中表现在他们勇于独立思考和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奋发进取的决断精神上。以当时新型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论,他们与慨叹救亡危害、打断启蒙的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也不是如现今有的学者断言的处于“两难”困惑境地,而是自觉地把救亡置于第一位,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最大阻碍。毛泽东就针对在国民思想启蒙中有重要作用的教育事业指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⑦而这一切都基本为反动统治者所控制,不把它们推翻,广泛的人民教育只能是空谈。李大钊等还进一步指出救亡斗争本身与启蒙也一脉相通,他们指出,“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这种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⑧实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革命队伍同革命的敌人展开政治、军事、经济的斗争,同时也不断荡涤自身的封建主义等剥削阶级影响。

二是彻底的求实作风。从五四到建党时期的全国各党派看,首先,只有他们做到了真正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指出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起来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而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回避甚至歪曲这一事实。就足以反映社会解放尺度的妇女解放问题论,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言及废娼问题时大多强调提高妇女教育程度、改良妇女就业条件等枝节问题,李大钊则明确指出“根本解决的方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

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⑧其次，他们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中找到了解决根本改造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和行动榜样俄国十月革命。“五四”后潮水般涌来的各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科学理论，都曾宣称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药妙方，其中不少都不同程度地吸引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在湖南驱张运动中有“专把湖南一省弄好”，逐渐“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⑨的幻想，明显是胡适的社会只能一点一滴改良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邓中夏、施存统等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支持下相继参加了北京、上海工读互助团，直接试验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毛泽东甚至还大声疾呼贵族资本家在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感召下“回心向善”“助人而不害人”。^⑩但这些“主义”、“方案”终于一一失败，从而使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事实面前确认：“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⑪“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⑫再次，他们对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也没当作教条顶礼膜拜，实际提出了马列主义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李大钊指出，“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它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适用到实际”中，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⑬毛泽东强调“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必须对它“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⑭做到“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各种学理”，^⑮都表达了同一思想。当然，他们实际远没有自觉坚持做到这一点。在中国革命道路上，他们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表现出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的缺点，在思想文化战线，他们自“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起就以资产阶级思潮为主要批判对象，而忽略了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但是，这个思想萌芽仍然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就是它在历尽风雨之后，长成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参天大树。

三是强大的凝聚力量。首先，他们明确指出“民众的大联合”是中国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他们强调指出，这个“大联合”顺应了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历史潮流，实属必然，“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怒涛西迈，转而东行”，发生了‘五四运动’”而有中国“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这个“大联合”以反映中国社会各阶层切身利益的“小联合”为基础，又有“纯然对外”的共同目标，最终必将把中华民族引向“光华灿烂的世界”。其次，他们明确指出，“大联合”必须以下层工农劳动大众为主体，同时努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乃至个人。毛泽东强调五四运动民众的大联合不同于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的只靠“少数所为”，而是主要依靠替“田主和工厂老板”“做工的千万平民”，同时又指出“全国商会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国民外交协会”等不乏资产阶级人士的社会团体是这个大联合的有机组成部分，^⑯就体现了这种思想。毛泽东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和驱张运动时就相当自觉地这样做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这个特点实际构成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最初萌芽。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逐渐最终转化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从此有了坚强核心。1920年夏秋，北京以李大钊为中心，通过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公开或秘密的社会团体，团结了一批革命精英；上海以陈独秀为首、通过《新青年》社等社会团体，聚集了上海乃至全国的一批革命青年，“南陈北李”密切配合，实际构成了全国的两个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和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同一期间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建立,中国人民的革命团结进入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为核心的新纪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既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又是这个运动的先驱。尽管它也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有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缺点,其中有些人如陈独秀后来终于退出了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个别人甚至堕入反革命的泥坑,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总体上无愧为近代中国最奋发有为的一批时代骄子民族精英,他们的革命业绩开拓精神,将永远如猎猎战旗光彩夺目,象阵阵春雷催人猛进,伴随我们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披荆斩棘,坚韧不拔,勇往直前!

注:

- ① ② ③ 《每周评论》1919年1月12日,4月6日,4月20日。
- ④ 《五四运动文选》第223页。
- ⑤ 张国涛:《我的回忆》第一册第82页。
- ② ⑨ ⑪ ⑭ ⑮ ⑯ 《新民学会资料》第60页,第148页,第96—97页,第148页,第129页,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
- ⑥ 《星期评论》1919年6月22日。
- ⑦ 见《东岳论丛》1989年第5期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张静如、姜秀花文。
- ⑧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648页,第183页;上册第648页;下册第363页,第597—598页;上册第680页,下册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
- ⑨ ⑫ ⑬ ⑭ ⑮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50页,第120页;上册第520页,第517页;中册第67页;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一版。
- ⑭ ⑮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282—290页。
- ⑰ ⑱ 《关于陈独秀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 ⑲ ⑳ ㉑ ㉒ ㉓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6—401页,第416页,第341页,第414页,第338页—39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 ㉔ 参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汪澍白张慎恒文。
- ㉕ ㉖ 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王学启张继昌文。
- ㉗ 参见《“一大”前后(一)》。
- ㉘ 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37页。
- ㉙ 参见夏禹龙主编《中国文化发展的转机》第98—99页,1989年上海知识出版社版。
- ㉚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53—154页。